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张懋镕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张懋镕 著

科学出版社

200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集了作者20年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33篇。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书中既有关于新出青铜器意义价值的探讨,也有结合传世青铜器,从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铸造工艺作多方面综合研究。在铭文研究方面,除了考释字词,更多地结合历史来探讨商周时期的年代学、社会制度、文化递嬗以及王室与诸侯国、周边民族的关系等问题。

本书可供古文字、青铜器、商周史的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张懋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ISBN 7-03-010330-0

I. 古… II. 张… III. ①汉字:古文字-文集②青铜器(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H121.53②K876.4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0388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印数:1—1 000 字数:330 000

定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张懋鏊，1948年生，江苏苏州人。1968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赴陕西省城固县双井乡涂家村插队劳动。1972年招工，入城固县化肥厂工作。1978年秋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同年考取研究生，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1985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主要从事古文字、青铜器、先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7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张懋镛教授潜心于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已逾二十年，其论作甚丰，很为学术界推重。现在他将散见报刊的论文，加上未发表的新著，选出 33 篇，辑成一书，题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肯定会得到学者与同好的欢迎。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最富有特色的标志，也是众多文物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青铜器得到专门著录和研究非常早，过去容庚先生曾指出：“图录彝器之书，莫备于《三礼图》。《隋书·经籍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谿等撰，其书不侍。宋聂崇义撰《三礼图》，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实原于郑玄、阮谿、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之言。然出土彝器取与《礼图》较，每不相合。”这一类书籍多出想象，还不能说是真实的著录。后者的肇端，应数北宋的《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记》和李公麟《考古图》。该三书都已佚失，今所能见最早的是吕大临《考古图》，体例业已成熟具备。吕书序署元祐七年，即公元 1092 年，到如今已经有 910 年了。

现代的青铜器研究，自然与北宋以来的传统大不相同。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学科的进展更是迅速。造成这样新趋势的原因，除出土材料大量增多以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多方面的研究取向。由宋到清，青铜器虽极受重视，但出于当时一般学风的影响，对青铜器的鉴赏首要在其铭文，没有文字的器物每易为人忽略。现代的研究则兼重各个方面，包括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以至艺术成就，这便显然超越了传统研究的范限。

第二，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由于对青铜器的考察及于其种种方面，很自然地把许多有关学科引导到研究中来。现代的青铜器研究已经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诸如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科技史、美术史等等，都得到结合利用，从而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是以考古学为基础。与过去的研究，限于历史条件，只能有所谓“传世”，即偶然发现甚至盗掘的材料。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后，尤其是近年间，田野考古工作成果卓著，获得大量有科学记录的青铜器，使我们有可能运用考古学方法，对青铜器进行有系统的分期和分域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说，青铜器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若干居于这样新发展潮流前缘的学者，懋镛即其中之一。他的特点是少承家学，熟悉文物，在西北大学攻读研究生后，又长期在考古专业执教。他的训练背景，使他能并擅传统与现代青铜器研究的优长。

读者看这部《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全书分为“古文字考释”、“新出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综合研究”、“金文与商周史”四部分，足见其涉足的广泛，然而仔细阅读，即可看出他多年的工作还是有其重心。

重心之一，是对“族徽”与“日名”的研究。所谓“族徽文字”和“日名”，在金文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更是商代金文研究的关键问题，惟其确切意义，虽然有好多学者探索，仍有不少没有揭示之处。懋镛于此用了长期功夫，反复辨析，澄清了一系列疑难。书内《早期金文和远古陶器刻绘符号》文，也与此有一定联系。

还有一个重心，是新出现青铜器的考察讨论。懋镛多年注意新材料，并常亲身搜集察看，深入分析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这不仅见于书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各篇，也可在其他部分看到。所论的青铜器，如静方鼎、虎簋盖、史密簋等，都有较大难度，能显示作者的功力。论高陵君鼎等文，小中见大，也可知作者的根柢。

书中各文，还表明了懋镛治学态度的端正矜慎。他论述金文史事，征引文献，从不牵强附会，不做过分推论，与一些文章多凭臆想截然不同。这也是我乐于在这里推荐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应该在这里说一下，张懋镛教授对青铜器鉴定辨伪有很多研究，但限于这本论文集的性质，没有专文收录进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与曹玮先生合著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必能有所收获。

李学勤

2002年3月28日

目 录

序	李学勤 (i)
---------	---------

古文字考释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	(1)
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	(8)
对“肇祺”解释的再商榷	(11)
略谈《殷周金文集成》的失误	(13)
早期金文和远古陶器刻绘符号	(20)

新出青铜器研究

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	(24)
史密簋与西周乡遂制度——附论“周礼在齐”	(34)
静方鼎小考	(42)
静方鼎的史学价值	(44)
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	(49)
再论虎簋盖及相关铜器的年代问题	(55)
秦昭王十五年高陵君鼎考论	(62)
“王太后右和室”铜鼎考略	(66)
晋侯墓地文化解读三题	(69)

青铜器综合研究

商周方鼎探论	(75)
西周方座簋研究	(88)
再论西周方座簋	(98)
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散论	(112)
殷周青铜器埋藏意义考述	(138)
商周青铜容器底部刻划初探	(144)

金文与商周史





金文所见西周世族政治	(154)
------------------	-------



镐京新考·····	(162)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165)
卢方、虎方考·····	(172)
《保卣》——殷周文化合璧的物征·····	(177)
金文所见西周召赐制度考·····	(184)
西周时期齐国军事初探——兼论齐国称霸原因·····	(192)
周厉王在位年数考·····	(199)
西周懿、孝、夷三王在位年数蠡测·····	(203)
西周王年问题琐谈·····	(211)
周人不用日名说·····	(217)
周人不用族徽说·····	(223)
商代日名研究的再检讨·····	(231)
后记·····	(241)


古文字考释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

自北宋吕大临编撰《考古图》，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始见著录。而后，族徽文字资料不断问世，其研究也渐趋精密。近千年来，历代学者如薛尚功、阮元、吴大澂、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殚思竭虑，孜孜求证，族徽文字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成果丰硕^①。

可是，如果将族徽文字研究与其他古文字研究相比，就会发现，族徽文字的辨认、考释却是古文字研究领域中一个用力甚勤而收效不大的方面。只需浏览一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就很清楚，我们现在确认的那些族徽文字，宋人也多半认识，他们误释或没有释出的文字，我们也多半不能确认。尤其是对那些出现频率高，亟待确认的文字如、、、等，歧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定论。至于那种认为容庚《金文编》附录中所收文字（相当一批是族徽文字）多能确认的看法，显然是不了解族徽文字的特殊性。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族徽文字的认识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呢？试以字为例。自宋人释为“析子孙”后，清人亦多从其说。而吴荣光则指出“恐即鼎之古文”^②，主张它是一个字。王国维认为“像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也把它作为一个字看待^③。丁山、郭沫若释“冀”^④。白川静谓“余意此即与子相同”^⑤。这些结论大相径庭。1979年于省吾发表文章将其释为“举”字^⑥，于先生首先从形体上分析此字像人正立两手向上举子之形，其下部与邵钟“虞”字下部形体相近；又论证举与举为双声叠韵，从音韵上加以阐明；继而又巧妙地运用民族学资料，将商周文字与么些族文字相比较，并引证古文献“古代生子以举为言，也以不举或弃为言”，由此结论“由于他们祖先有过如何举子的事，或者有弃子复举的故事，所以后世子孙才造出象征性的文字，以为氏族的标志”。于先生综合运用古文字、古文献与民族学资料，从形、音、义三方面求证，是字考释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也是族徽文字考释中最能体现当今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论作。

李学勤先生关于“孤竹”的考释，也是族徽文字考证中的一个范例。辽宁喀左北洞一号坑出土一件铜器，上有族徽文字二字。李先生指出第一字的上部左半边像《说

文》徐锴所言“外象其蔓，中象其实”的“瓜”字，而《古玺文字征》中令狐佗的偏旁“瓜”的形状也与之相似。𠄎字又见于春秋铜鬲的𠄎姬即狐姬。第二字不是冉字，冉有毛，像毛冉冉，此字与竹字近。𠄎即文献所说的孤竹国。李先生特别从地望上分析孤竹作为商分封的同姓侯国，在今河北卢龙南，“领域应包括很北的地区。孤竹铜器在喀左发现，决不是偶然的”^⑦。孤竹国所处时代、地域与铜器族徽文字的时代及出土地点都较合拍，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诚然，这些结论均远超前人，但仍有可商榷之处^⑧，如果不能证明举或孤竹是它们惟一的解释，那么关于它们的考释就没有结束。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考释族徽文字时（除了那些比较容易认识的字不需要再作考释外），很难做到这一点，即无法证明自己所作的结论是惟一正确的解释^⑨。

我们认为，族徽文字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商周古文字的特殊古文字，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来考释。我们可先回顾一下考释一般商周古文字的方法。如杨树达所归纳的“首求字形之无牾，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⑩。接着杨氏举出不少彝铭来说明他的观点。我们注意到杨氏所举彝铭均为成句的铜器铭文，未涉及族徽文字。而所谓“终期文义之大安”、“借助于文法”，也都是对处于文句中的某一字或词而言。众所周知，只要这一字或词处于某句话中，就可以靠上下文义推定它的内涵。即便无法隶定，但至少可以圈定它的含义范围。1000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方法考释古文字，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用这种方法考释族徽文字却遇到麻烦，因为族徽文字的表现形式极为奇特：一是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往往单独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二是即便与其他成句、成段的铭文一起出现，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即大多缀于铭文末尾，部分冠于铭首，也有少量处于铭文中间。它的出现仅仅表明这件铜器的族属，而与铭文没有其他意义上，特别是语法上的联系。

由第一点，我们想到大汶口陶器、良渚玉器等史前器物上的刻划符号。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它们是不是文字？再一个问题是，如果承认它们是文字，那么应该隶定成什么字^⑪？因为这些刻划符号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缺乏句子制约，各家的隶定不同，解释的随意性较大。族徽文字出现在古文字成熟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与甲骨文对照而考释出来。但就其独立性来说，大部分族徽文字与刻划符号有相似之处，因此难以隶定其字形和辨识其音义。

关于第二点，由于族徽文字与其他铭文貌合神离，使得我们无法用一般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因形求义循声，依据它在铭文中的位置来确定其词性与含义。所以，自宋代以来，面对族徽文字，学者们每每陷入困惑之中。吴大澂感叹“实难深信，心知其非，不能求其是”^⑫。



对于族徽文字表现形式的特殊性，由此带来的考释工作的困难，我们应有所认识。就举字和孤竹而言，迄今我们的考释没有超出20年前于省吾、李学勤二位先生的成就，

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随着《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相关资料的搜罗，综合研究能力的提高，应会有新的发现^⑩。

诚然，我们无法确认一大批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相当于现今何字，但将其划归为族徽文字，表明对它们的性质已有了大致了解。因此，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考释字词上^⑪。

二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进展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族徽文字往往与非族徽文字以联缀形式出现，在我们尚无能力区分哪一部分是族徽文字，哪一部分是非族徽文字时，往往把非族徽文字当作族徽文字看待。同时，除了一部分族徽文字以单字的形式出现外，还有一部分则以复合族徽的形式出现，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徽文字以联缀形式出现。关于复合族徽，已有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⑫，不再赘述。这里想谈一下族徽文字与非族徽文字的联缀形式问题。最常见的是册字与族徽文字的联缀形式^⑬。

以往这方面误说较多。如，刘心源以为“异册之象”，像两手举册之形；高田忠周确定为𠄎字的异构；徐中舒以为“爵”字之古文；白川静也主奉册之说，指出“是一种祝祓的仪礼”。于省吾提出它是册𠄎或𠄎册两字的古文，即甲骨文“工典其𠄎”的省语。再如，于省吾认为是工册的合文，工读为贡，谓祭祀时贡献简册以告鬼神。推言之，“豆册”的豆乃登之省文，登册乃登进典册之义^⑭。这里牵涉一个如何看待这种表现形式复杂的族徽文字的问题。人们很容易把它们与一般古文字类比，认为这个复合体是一个会意字，两个部分是相互作用的，即如高田忠周指认为𠄎字。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合文，但是他们又认为其中包含着有关册典的丰富含义，显然主张册与另一部分文字一旦联缀，就会产生新的意义，这实际上否定了族徽文字的独立性。在分析了大量与册有联缀关系的族徽文字后，可以看出册某或某册只表示某族氏曾担任过作册这一官职，缀上册字以示其出身。

我们注意到，“册”字很少单独出现，如册钺（《岩窟》下2）、册尊（《殷周金文集成》5463，下简称《集成》）；或与日名同出，如册册祖丁角（《集成》8327）、父己册角（《三代》16.44.7）、册父辛爵（《集成》8641）、册父乙卣（《三代》12.48.3）、册作父癸鼎（《集成》2259），例子不多。相反，册字经常与其他族徽文字如天、戈、木、羊、夫、史、丙、舟、守、束、光、告、豆、陆、韦等，联缀出现。假定册是一个具体的族氏名的话，它如此广泛地与其他族徽联缀是无法用复合族徽理论来解释的。因为它显然不可能派生出那些比它更古老的分族来，而那些大族也不可能派生出冠以同一名称“册”的分族。因此，册不是一个具体的族氏名，当它单独出现时，应是册某的省略式。册字有时也可以省略。如山东兖州县磁山区李官村出土的索氏铜器，索父癸卣上带册字，而索父癸爵上不带册字^⑮，所以实际上带“册”的铜器铭文要比见到的更多些。

何以见得册是作册的省称呢？金文自身证明了这一点：

(1) 作册鬲卣铭：“唯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鬲鬯贝，鬲扬公休，用作父乙宝鬲彝。鬲舟册册。”（《三代》13.39.3~4）

(2) 作册般鬲铭：“王宜人方无斁，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己鬲。册。”（《三代》5.11.1）

(3) 作册矢令簋铭：“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鬲俎于王姜。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鸟丙册册。”（《三代》9.27.1）

(4) 作册大方鼎铭：“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室，用作祖丁宝鬲彝。鸟丙册册。”（《三代》4.20.3~5）

(5) 作册折尊铭：“唯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折兄（颺）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鬲，其永宝。木羊册册。”（《陕青（二）》第30页）

(6) 丰卣铭：“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令丰寤大矩。锡丰金、贝，用作父辛宝鬲彝。木羊册册。”（《陕青（二）》第35页）

(7) 痍盨铭：“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师录宫，格太室即立。司马収右痍，王呼史年册锡……。木羊册册。”（《陕青（二）》第49页）

(8) 帝麓鼎铭：“庚午，王令帝麓省邳田四品，在二月。作册友史锡鬯贝，用作父乙鬲。羊册册。”（《三代》4.11.2）

以上(1)~(4)显示器主时任官职为作册，而铭尾所缀族徽中有册或册册，此乃册即作册省称的证据。作册矢与作册大为同一家族人，先后担任王朝作册的官职，无疑其家族为作册世家。(5)~(7)乃微史家族四代人作册折、作册丰（折之子）、史墙（丰之子，史官相当于作册，器见墙盘）及痍（墙之子）的铜器，铭尾所缀族徽，是其家族世代为作册的明证。(8)中，帝麓受作册友（右）史的赏赐，其当为作册右史的属下，自然是作册系统的职官，正与族徽相吻合。

此外，还有士卣卣铭“唯王大龠于宗周，延饗莽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眾史寅寤（殷）于成周。……臣辰先册册。”士上是人名，虽未冠以作册头衔，但从他与史寅一起去殷见诸侯来看，正属作册职官范围内事，也与他的作册家世相吻合。

综上所述，凡是族徽文字与册或册册联缀出现，表明此氏族为作册世家。而册字如此频繁地与族徽文字联缀出现，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结合模式，表明作册作为一种职官的较高地位。它的具体含义如何，自来争论较多，简要地说，它即是后世意义上的史官，可能职掌的范围要大些。因为它盛行于殷代与西周早中期，至西周晚期渐趋消亡，而我们通常说的史、大史、内史等史官，除了“史”在殷代已出现，其他要晚到西周，况且殷代的“史”也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史官，“作册”与“史”有一个并存且交替兴衰的过程。“作册”在殷代与西周早期担任着类似“史”的角色，西周中期开始作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史”则日见蜕变，逐渐取代作册的地位^⑨。

显然，册不是一个具体的氏族族徽，但它与族徽结合，以一种比较稳定的形式出现；又与一般的非族徽文字有别。为了便于区分，我们称这种附加式的非族徽文字为淮

族徽文字。

“亚”字是又一个准族徽文字。亚字很少单独出现在铜器上，只有亚乙丁鼎（《贞松》2.10.2）、亚父庚且辛鼎（《三代》3.19.3）、亚鼎（《陕青（一）》176页）、亚父辛爵（《三代》15.23.5）、亚父辛簋（《三代》6.18.6）等少数铜器，且多与日名同出。亚字绝大部分与其他族徽文字如戈、史、醜、彘、夔、兽、奚、弜、束、守、舟、光、共、耳、尹、聿、告、受、牧、啟、若、鸟、隻、鱼、覃等联缀出现。

关于亚字的含义，自来争执不一。这里不妨将亚某铜器与册某铜器作个比较。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异同之处：

其一，相同点是它们都与其他族徽文字结合，而它们本身并不是族徽文字。正如册字，使某一氏族具有曾任作册官职的标识，亚字的附加，推测也应该具有相类似的标识作用。如前所言，作册地位较高，族徽附加册字是一种荣耀，亚字也应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是一种职官，而且是一种地位较高的职官。

其二，不同的是除了一件亚册舟爵（《集成》8780）外，册与亚绝不同时出现在某件铜器上。它们可以分别与戈、史、丙、束、光、告等族徽文字联缀出现，但不会同时与其中的一个族徽文字结合出现。即应理解为当某个氏族拥有作册官衔时，便不能同时拥有亚的官职。考虑到作册的职掌范围近于后来的文官，那么将亚解释成一种与之相对的武官，恐怕还是比较合适的推测^②。

妇好墓出土的其罍、亚其觚、亚其爵，是为同人之器。亚其可以省作其，推而想之，省去亚的族徽铜器当不在少数，所以“亚”世家的铜器实际上比我们所见到的要多得多。

“子”是又一个准族徽文字。它可以单独使用，如子觚（《集成》6525）、子勺（《集成》09902）、子觶（《小校》5.68.8）、子戈（《集成》10693）、子卣（《三代》12.35.7）、子鼎（《薛氏》6.1），或与日名一起出现，如子父癸解（《集成》6323）、子祖辛爵（《三代》16.2.10）、子癸簋（《集成》3071）。相对来说，单独出现或与日名联缀的数目要比册、亚多。同时它常以子某的形式出现，如子妥鼎（《三代》2.11.9）、子渔罍（《集成》9174）、子系爵（《三代》15.30.5）、子保觚（《集成》6909）、子殷尊（《小校》5.23.5）、子步祖辛尊（《三代》11.13.6）等。“子”虽然可以单独出现在铜器上，颇像族徽文字，但其实不是族徽文字。首先从上述资料可见，所谓子某者，子妥的妥、子渔的渔、子系的系都是私名，几乎没有见它们曾作为族徽文字单独出现。况且卜辞恒见子某，武丁时就有几十个，显然不能作为氏名来解释。其次，子是商代贵族宗法组织中的一种称谓，作为宗族的族长，身份地位较高，在殷代很多有名的铜器上有“子赏小子”的铭文，一般应为大贵族^③。如上举的子渔其人，从出土子渔器物的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的等级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二者是吻合的。

与册、亚相类似，“子”是一种爵称，一种身份地位的标识，因此器主常将其铸于器上，以显荣耀。“子”单独出现或仅与日名同出，应视为子某的省略式，这与册某、亚某可以径直以亚、册单独出现是一个道理。进入西周之后，“子”也曾缀于一篇铭文

的末尾，如御正良爵（《三代》16.41.2）与寡子卣（《三代》13.37.5-6）。参照嘏士卿父戊尊（《三代》11.32.7），尾末缀有“子黑”的族徽文字，前二器的“子”也应是“子某”的省略式。

三

在将准族徽文字册、亚、子与族徽文字区分之后，还必须把所谓私名与族徽分开。因为私名与族名也经常前后联缀在一起，如戈器作昏爵（《三代》16.32.2），戈是族徽文字，而第二字究竟是私名，抑或分族族徽，如果不能正确区分，不是将私名误作族徽而视为复合族徽，就是将复合族徽的后一部分——分族族徽视作私名，给考释增添了困难。

根据族徽文字在铜器上出现的形式，可规定出几条检验族徽与私名的标准：

（1）作为族徽文字，一般多属殷代；如果遇到西周时期才出现的新的族徽文字，应要特别注意甄别。因为自西周早期开始，随着族徽文字的减少，私名大量出现在铜器上。原本是族徽文字与私名联缀出现，但有时往往省略族名，只存私名，且私名都是铭首第一字，很容易被当作族名看待。

（2）族徽文字出现的次数一般来说要多于私名出现的次数。如果一个所谓的族徽文字只出现过一次，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不少私名就只出现一次。

（3）出现时间比较早的族徽，文字形体相对显得更加象形，与西周早期才出现的许多私名写法有明显的区别。

（4）早期族徽文字常常以单独形式出现。当然单独出现也未必就是族徽。

（5）由于族徽文字的独立性较强，因此，当它与其他铭文一同出现时，两者之间有时会保持一定距离，或分铸两处。

（6）当族徽文字与其他铭文联缀时，除在铭首外，还可能在铭末或铭中。而私名一般都在铭首。

需要注意的是，族徽文字与非族徽文字的含义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时代的迁移，一部分非族徽文字的私名也会转化为族徽文字。在商代晚期铜器上，恒见子妥、子渔、子黑、子奔等私名。但到了西周早期，有些子某成了族氏名。前举嘏士卿尊，末尾所缀“子黑”显然是族徽。器主当是子黑的后裔，他以祖上的私名作为新的族氏名。子卣也是私名，其器物有尊（《西清》9.23）、爵（《三代》16.30.3）、卣（《西清》15.3）等。在西周早期，主要是西周中期多缀于铭文末尾，如兽作父乙卣（《白鹤》13）、单作父乙尊（《集成》5920）、魁作祖乙尊（《三代》11.26.8），它成为这些器主的共同的族徽。邲其三卣是殷代有名的青铜器，三器铭尾所缀族徽是亚猷，即其族氏名。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岐山北郭乡出土了一件亚邲其卣，则显然是将邲其这一原本的私名转化为族氏名了。需要说明的是，怎么衡量私名已经转化为族氏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当我们了解了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特殊的表现形式，并将族徽文字与准族徽文字，






包括私名在内的非族徽文字区分开来后，族徽文字的真实面目就比较清晰了，这有利于族徽文字考释研究工作的开展。

(原载《文物》2000年2期)

注 释






- ① 张懋镕：《一千年来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评》，待刊。
- ② 吴荣光：《琇清馆金文》。
-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祖下》，中华书局，1959年。
- ④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 ⑤ 白川静：《金文通释·员鼎》，白鹤美术馆，1965年。
- ⑥ 于省吾：《释𠄎》，《考古》1979年4期。
- ⑦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5期；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 ⑧ 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饶宗颐：《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駝》，《文物》1998年1期；周萌：《古文字札记二则》，《汉字文化》1990年3期。
- ⑨ 参阅秦建明、张懋镕：《说𠄎》，《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
- ⑩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自序》，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⑪ 参阅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1期；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3期；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2期。
- ⑫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 ⑬ 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摘自〈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的资料 and 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
- ⑭ 近年来，殷玮璋、曹淑琴二位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排比有关铜器，研究上古国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拓宽了族徽文字考释研究的领域。参阅①。
- ⑮ 林沅：《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3期。
- ⑯ 有关册、亚的解说，请参阅⑮林沅文；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文物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曹定云：《“亚弜”、“亚啟”考》，《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⑰ 于省吾：《释古文字中的𠄎字和工册、弜册、豆册》，《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
- ⑱ 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7期。
- ⑲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
- ⑳ 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 ㉑ 林沅：《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

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




东（繁体写作“東”）字，甲骨文、金文中常见，有、、诸形。《说文》曰：“东，从口在木中。”“从日在木中”固然可解为日东升于林中，然又何尝不可解为日西坠于林中呢？况且、二形也与“从日在木中”并不相干，许说谬矣。故近世学者认识到：东字，与西、南、北诸字一样，虽用指方向，但字形本身并不显示方位，仅仅借音而已。





















那么，它的初义是什么呢？在甲骨文中，“东”或用指地名，如：“奠于东三小宰”（粹编·四六三），“东受年”（粹编·九〇三）；或用指方向，如：“自东西北逐沓麋，亡戕”（粹编·九五七）。自然，这并非东之初义。因此，几百年来，学者们不断探索。其中徐中舒、丁山谓即囊字，唐兰谓即束之异文，颇有见地；然字形虽近，终非一字，东之初义仍然没有确切答案。因为不清楚东字之初义，势必影响到对与东有关之字的认识。我们认为，要考察东字的初义，不能仅就东字进行孤立的研究，应从与东有关的字中去探索。




在甲骨文、金文中，与东有关之字按其特性可归纳为三类：

(1) 表明东是一实物的：由知东可背负；由知东可手执；由知东可由两人抬起之物；由知东可由斧斤斫、斩之物；由知东可置放于崖边。

(2) 表明东是一种植物：由、、可知东生长于田、土中。

(3) 表明东是食物的：由知东可以烧烤，由、知东可置于锅里烹煮。

总之，东既生长于土、田之中，而又能为人们所食，自然是植物性食物了。康殷在《文字源流浅说·释例篇》中认为“在周金文的、、、等字形中则应是像鸟类的胴体形”，如是鸟类的胴体，焉能生殖于土田之中？再说，像东植于土中，抽枝长叶的形象；、、、诸形像巢在阳光下生长的形态，字从口乃从日的省文（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量》），丝毫没有鸟类胴体的痕迹。另外甲骨文中（前二·十八·四）、（前七·十二·一）、（前五·十八·四）、（后上·十三·四）诸形，均像巢植于土中，生长出块茎状东西。在这里，或作形，由曹字甲骨文或作（前二·五·五），重字成侯钟作可为证。甲骨文中更有一形作，维妙维肖地画出东在阳光下生根结实的形象，这是否定“东像是鸟类的胴体形”的佳证。

由上述分析可知，东作为植物性食物，实际上就是农作物，泛指粮食。、、（见《说文古籀补》40页）均是用勺在鼎内勺饭状，因为“饭”这一概念很难形象地表示出来，它或是稻米，或是麦面，或是芋头之类的食物，或为颗粒状，或为粉状，也可